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暮春之初會稽山陰之蘭
亭脩賢羣至少
有嶮^{崇山}領茂林脩

在癸丑暮春之初
之蘭亭^{秩事}
少長咸集此地
脩竹又有清流激



中國書法 技法寶典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晓青
封面设计·精英设计室

传世真迹、原拓、初拓本之荟萃

中国历代经典名碑、名帖之集成

专家学者撰文、简化字标点释文

印制精美、版本统一、便于藏阅



ISBN 7-5170-2068-6



9 787517 020683

编：曹萌

中国

书法技法宝典

(隶书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目 录

(隶 书 卷)

第一章	隶书的历史渊源	(1)
第一节	源流与发展	(2)
一、	古隶和今隶	(2)
二、	唐代隶书	(4)
三、	清代的隶书	(6)
第二节	书艺特点及类别	(6)
第三节	名家简介	(13)
(一)	秦汉隶书家	(13)
(二)	唐代隶书家	(15)
(三)	清代隶书家	(16)
第四节	隶书名家及其作品概览	(20)
(一)	涂浩薰阳观记	(26)
(二)	李隆基纪泰山铭	(27)
(三)	石头孝经	(28)
(四)	韩择木荐福寺大戒通津师之碑	(29)
(五)	梁升御御史台精舍碑	(30)
(六)	宋珏 隶书七言诗轴	(31)
(七)	郑璠 隶书浣溪沙轴	(32)
(八)	万经 隶书七言联 (一)(二)	(33)
(九)	桂馥 隶书文心雕龙语轴	(34)
(十)	桂馥 隶书七言诗句扇页	(35)
(十一)	钱泳 隶书五言联	(36)
(十二)	邓石如 隶书八条屏	(37)
(十三)	伊秉绶 隶书五言联	(38)
(十四)	陈鸿寿 隶书五言联	(39)
(十五)	何绍基 隶书七言联	(40)
(十六)	何绍基 佑绍隶书轴	(41)
(十七)	戴 易 隶书七言诗句轴	(42)
(十八)	杨 岷 临西岳华山庙碑	(43)
(十九)	杨 岷 隶书五言联	(44)

(二十)	王旭远	隶书集三公山碑联	(45)
(二十一)	俞樾	隶书孝武崇儒轴	(46)
(二十二)	赵之谦	隶书七言联	(47)
(二十三)	吴昌硕	隶书五言联	(48)
(二十四)	沈曾植	临石门颂扇面	(49)
(二十五)	董大丰	隶书扇面	(50)
(二十六)	马公愚	隶书扇面	(51)
(二十七)	宁斧成	隶书四言联	(52)
(二十八)	罗叔重	隶书七言联	(53)
(二十九)	宫葆诚	隶书顾况诗	(54)
(三十)	高凤翰	隶书读书铭轴	(55)
(三十一)	汪士慎	隶书五言诗轴	(56)
(三十二)	丁敬	隶书五言诗轴	(57)
(三十三)	钱大昕	隶书七言联	(58)
(三十四)	阮元	隶书十二言联	(59)
(三十五)	张廷济	隶书长笛赋轴	(60)
(三十六)	金农	临华山庙碑	(51)
(三十七)	梁同书	隶书轴	(62)

第二章 隶书笔法技巧分析

第一节	笔画形态分析	(64)
第二节	偏旁部首分析 (形近字与异形字同异举例)	(64)

第三章 隶书结构技巧分析

第一节	依字成形	(72)
第二节	分合皆宜	(72)
第三节	偏旁有序	(73)
第四节	笔画呼应	(73)
第五节	和谐自然	(74)
第六节	创新巧变	(74)

第四章 隶书大字谱

第一节	基本笔画	(76)
第二节	偏旁部首分析	(88)
第三节	隶书的字体结构特点	(111)

第五章	隶书创作章法布局	(121)
第一节	章法要领	(122)
第二节	书写形式	(123)
第三节	落款用印	(127)
第四节	学习方法	(128)
第五节	创作杂谈	(130)
第六章	学习隶书的优秀范本	(137)
第一节	《石门颂》	(138)
第二节	《礼器碑》	(141)
第三节	《封龙山颂》	(144)
第四节	《衡方碑》	(148)
第五节	《史晨碑》	(153)
第六节	《西狭颂》	(158)
第七节	《曹全碑》	(162)
第八节	《张迁碑》	(166)
第九节	汉隶名碑集联示例	(169)
第七章	隶书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意蕴	(179)
第一节	波磔的韵律	(180)
第二节	横向的张力	(180)
第三节	垂笔的延宕	(181)
第四节	隶书气势的美学内涵	(181)
附：汉隶十大名碑鉴赏		(183)
	《石门颂》	(185)
	《乙瑛碑》	(215)
	《礼器碑》	(245)
	《华山碑》	(275)
	《鲜于璜碑》	(305)
	《衡方碑》	(335)
	《史晨碑》	(365)
	《西狭颂》	(425)
	《曹全碑》	(455)
	《张迁碑》	(485)

第一章

隶书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源流与发展

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成的一种特殊书体，很早就流行于民间，实际上是篆书的一种潦草写法。隶书是对小篆书法的革新，从实用的特点出发，隶书显然优于篆书。它笔增提顿，变弧为直，变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有了粗细巧拙的变化，丰富了书法的表现手法。隶书大胆运用夸张手法，变篆书的精神内含为气象外耀，把横和捺加以强调和装饰，波势磔尾，舒展多姿，情趣盎然。隶书字形多取横势扁方，布列均匀，平中寓奇，挪移生动。隶书逐步取代篆书，这是书法史发展的必然，是汉字书法史上一次深刻的变革。隶书的产生彻底改变了小篆和小篆以前古文字的面貌，使汉字更加点画化、符号化，也为后来楷、行、草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隶书在我国的书法发展史上风格别具，光彩夺目。从秦汉至近代，曾经涌现出了许多隶书大家，他们勇于创新，勤于实践，为后世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绚烂多姿、千变万化的隶书作品。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隶书以其实用和装饰的特点，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各类规模的书法展览、比赛中，隶书作品数明显优于篆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隶书以其具有其他书体不可替代的特点，所以在现代社会的实用和装饰设计中，被广泛采用。隶书比篆书通俗实用，比楷书生动多变，比草书规范易认，所以，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普遍喜爱。

隶书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隶书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是秦汉时期，即古隶和今隶时期，这一时期的东汉是隶书发展鼎盛和最辉煌的时期；二是唐代，即隶书发展的守成时期，或称楷书化时期，有人称之为程式化时期；三是清代，是隶书中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时期，也是隶书发展的集大成和总结期，对我们今天的隶书学习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将隶书的发展演变分别加以叙述。

一、古隶和今隶

隶书，又称为“史书”、“佐书”或“八分”，是继篆书之后而兴起的一种书体。它最早源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形成于西汉，到东汉时期已很盛行。它是由

篆书省易、简化、演变而成，隶书由于风格多样、历史悠久，所以既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古隶和今隶是指隶书的分期而言，隶书按具历史发展分为古隶和今隶两个重要时期。古隶又称隶隶，是隶书的初创期，指秦至两汉初期的隶书；今隶又称汉隶，是隶书的成熟期和兴盛期，指东汉时期的隶书，是隶书的主要代表。

隶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的楚帛书和竹简上，就出现有写法草率、字形扁平、体式简略的字体。当时的玺印、货币、陶瓦、铜器、刻石上也有打破篆书用笔和结构的简约文字，这可以看作是古隶的先导。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是秦隶的代表，它包含有大篆书的体势及笔意，介乎于篆隶之间，已经完全冲破了秦篆的约束，写来自然随意。其特点是：减少盘屈，化繁为简，圆看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为正方，个别字亦有蚕头雁尾的雏形。西汉初期继承秦制，其中包括文字制度，所以西汉的隶书与秦隶无太大的区别。其隶书犹有篆意，但明显减弱，已逐步将圆转改为方折，有的字体已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蚕头雁尾和上挑的笔势。笔画的粗细变化十分明显，形体质朴厚重。《五凤刻石》及《莱子侯刻石》为西汉隶书的代表。《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泮池刻石》，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年久而剥落，但隶法高古，体势方正，结字茂密，用笔奇放，易圆为方，粗细不拘，章法自然，是秦隶嬗变时的风貌。《莱子侯刻石》，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刻，隶书7行，有界格，现存山东邹县孟府。笔道尖细遒劲，无蚕头雁尾，结体宽博，气息朴厚古拙。西汉末年，完成了隶变的任务，隶书完全成熟。

隶书进入东汉，发展为全盛时期。东汉隶书在秦隶和西汉隶书的基础之上进行改易，开始有意识地追求齐整和美观。点画波磔分明，篆意完全脱尽，结体多为扁平、方正，日趋严整精工，波磔分明，左右八分，所以又称为“八分书”，被尊为隶书的楷模。关于隶书，胡小石先生在《书艺略论》中说：“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这句话既解释了八分，又概括了汉隶的主要特点，左舒右展，分张外拓。东汉是隶书的大盛时期，是隶书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立碑之风极盛，民间书手大看涌现，碑碣纷呈，美不胜收，千姿百态，蔚为大观；书风或平直端稳，应现入矩；或舒展华美，烂漫多姿；或斩截严正，雄厚茂密；或奇险峭拔，雄放恣肆。

关于隶书的产生，历来有程邈创隶的说法。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一种新的字体远非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创造，也决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它是经

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积累、总结和创造完成的，可认为程邈是这其中的一页，或者看作是代表人物，他对隶书作了整理、搜集和总结，对隶书的推广应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代擅长隶书的书法家有王次仲、蔡邕，师宜官、钟繇、梁鹄、郭香察、仇靖、仇绹、朱登等，而大量精彩的汉碑却没有留下书写者的姓名，这大概与书碑者的地位低下有关。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有金文书法时期和北碑书法时期，许多书艺高超的书法家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他们精湛的书艺和美妙的书法却有赖于金石碑刻而得以流传久远。

汉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代，其特点在于造成了一种书法文化的氛围，书家辈出，书体皆备。汉承秦制，在严集郑擅的场合仍沿用篆书，但占统治地位、被广泛使用且能代表汉代整体书法风貌的还是隶书。在隶书定形化的同时，草书、楷书也在隶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及秦篆是汉字书法古文字阶段，隶书的出现开了今文字的先端。所以，隶书便成了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上承先集，下启魏晋，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它彻底改变了小篆以前古文字的面貌，使汉字进一步点画化和符号化。隶书的定型化称为“隶变”，它是继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之后，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次大变革。把篆书的多圆转变为隶书的多方折，将纵长取势变为宽扁见长，有意识地运用夸张手法，或增或减，或收或放，以增华饰，这是隶书不同于篆书的特点所在。所以，隶书的完全成熟，被认为是书法自觉时期的到来。

二、唐代隶书

隶书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讲求点画的规矩严谨和八分舒展的装饰特点，结字亦板滞森严，缺少变化，这表明隶书的发展已走到了末路。这种现象在《熹平石经》、《白石神君碑》等碑刻中已非常明显。到此为止，隶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新兴书体——楷书的冲击，并逐渐被楷书所替代，隶书的衰落也就势在必行了。楷书取代隶书，就像当初隶书取代篆书一样，是书体演变的规律，是书法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魏晋时期，以新兴的楷、行、草书为主要代表，而隶书只不过是汉末的流风余绪而已。这一时期主要的隶书作品有：传为魏钟繇的隶书《上尊号奏》、魏黄初元年所刻的《受禅表碑》，传为梁鹄所书的《孔羡碑》、三国青龙三年刻的《范式

碑)、《曹真残碑》等。这些隶书碑刻方峻扁平的笔道,矫揉造作的波磔,千篇一律的结体,已无法再现汉隶淳古厚重的风韵。但它们的意义却在于,为隶书向楷书过渡作了铺垫,开了唐人隶书楷书化的先河。从南北朝至隋,已是楷、行、草书发展的鼎盛时期,隶书有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字,或是复古、尊古者的崇尚,虽然还不时出现在碑石上,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隶书发展史上,从东汉末年到清代初年,真正把隶书发扬光大,既继承汉隶古风,又具有时代风貌的还是唐代。

唐代的隶书虽然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虽然没有像楷书、行书、草书那样成为唐代书法的最强音,却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唐代的隶书家有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维则、蔡有邻、殷仲容、李潮、白义晔、归登等。楷书有初唐四大家(欧阳有、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隶书也有四大家(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维则)。唐玄宗李隆基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人物,他的隶书作品有立于西安碑林入口处碑亭之中、作为西安碑林象征的高大雄伟、气势磅礴的《石台孝经》和刻于东岳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唐玄宗的隶书最具楷书化,用笔、结字缺乏变化,相同的笔画写法雷同,几乎可以重重,严谨规矩有余,活泼变化不足。韩择木为韩愈的叔父,以操隶书名重当时,作品有《祭西岳神告文碑》(现存西安碑林),用笔结字方整规矩,有汉隶余风。史维则的隶书有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大智禅师碑》,朴厚沉穆,稍显肥美。唐代隶书家中真正写出个性、有汉隶风韵的当推梁升卿。梁升卿为唐开元间人,历任奉天尉、广州都尉等,以擅长隶书著称。时人称其隶书“体甚古”,即有汉隶之风,笔势“如惊波往来,巨石前却”。作品有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御史台精舍碑》,此碑不大,亦立于不显眼的角落,但识者却一眼可以看出其不同凡碑,骨力清劲,体势从容,虽有界格,却能长短相宜,自然天成,全篇风格匀整统一。

汉代人写隶书由篆法人,讲中锋用笔,藏锋含蓄,虽波磔外显,却中和朴厚,高古雅逸。唐代人笔隶书,渐失古法,受时风影响,以楷法人隶,用笔过于方劲,气象过于外显,规整有余,含朴不足,所以不足为法。意代以后,隶书每况愈下,历代虽有能隶书者,如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征明等,他们虽然都是书法史上有名的行奉大家,但隶书却写得尽人意,与汉隶不可比肩。只有到了书道中兴的清代,古老的隶书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了汉代的气象,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给后人树立了汉代以后隶书变法的真正的典范。

三、清代的隶书

清代历时 268 年，是书道中兴的一代。它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但正由于此，它才有条件继承和发展历代书法艺术的成就，加之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使清代的文化艺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清代书法以乾隆年为界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称之为“帖学期”，宗董其昌和赵孟頫，受帝王好尚左右，以圆转流美为能事，后期称为“碑学期”，宗汉唐和北碑，以古拙朴厚为风尚，所谓“篆隶中兴”指的就是这一时期。

乾嘉以来，金石文字学、考古学兴起，学者书家大多瞩目于出土日增的两周金文、秦汉石刻、六朝墓志、唐人碑版等。隶书的兴盛自然和这些也密不可分。此时的书法家正苦于被“馆阁体”所束缚，创新无出路，借着文字、考古的兴盛，他们弃帖而尊碑，上溯周、董、汉、唐及北魏，尊崇传统，取道高古，给死寂的书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清代的隶书是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直逼汉人”，使中绝了近 1500 多年的汉隶右法得以恢复。清代隶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既继承了汉隶的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特点，开创了流派隶书。

郑簠是以隶书名世的书法大家。清代隶书最早取法汉碑。郑簠的隶书则取法汉代《史晨碑》及《鲁全碑》，并参以行草，其灵动的笔势，变幻的写法，婉逸秀美的态势别具一格，在清初书坛享有极高声誉。

郑簠之后还有很多以隶书著称的书法家，且都风貌独具，各领风骚，如伊秉绶以颜体入隶，顾石如以篆入隶，金农则吴碑入隶，赵之谦以北碑入隶，吴昌硕以吴碑入隶，可谓各有千秋，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除上述隶书名家之外，何绍基、桂馥、陈鸿寿、万经、郑板桥、高凤翰、陈允升、梁同书、俞樾等，举不胜举。在所有这些隶书名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集汉碑大成的何绍基和有“顾底隶而”之称的伊秉绶。

清代隶书名家灿若繁星，我们将另章详尽介绍。

第二节 书艺特点及类别

东汉时期，刻石树碑成风，流派纷呈，风格各异，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隶书大盛的书法世界。汉代碑刻及摩崖主要分布山东和陕西地区，大篆汉隶名碑现今保存于山东泰安的岱庙、曲阜的孔庙和陕西汉中博物馆及西安碑林。迄今为止，

出土发现的汉隶碑刻有400余种，而且仍在不断出土。汉碑留存数量之大，风格之多，可以和唐碑及魏碑墓志相比。而最突出者还在于汉隶碑刻书法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澐所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学隶须从汉碑入手，取法高古”，这是许多隶书名家的经验之谈。在学习中，要取法汉隶，就要对汉隶有所了解，从分析不同的风格流派入手，真正理解汉碑的博大精深和雄浑高古。关于汉隶的分类，书界历来观点有所不同，但大致都从总体风格入手来详细划分汉隶的类别。下面择其主要者介绍汉隶碑刻的四大类别。

一、体态端庄秀润典雅

汉隶中有为数不少平直端稳、应规入矩的碑刻，著名的如《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熹平石经》、《张景碑》等。此类汉碑的书风特点是规矩森严，端庄典雅，八分数势，秀美华丽，是汉隶书风纯熟期的典型代表作品。这类汉碑代表了汉代隶书的规范典型，是初学者习隶入门较理想的范本，如能认真钻研临摹，一定能取能成功。

《史晨碑》两面刻字，亦称为《史晨前后碑》。碑阳刻《史晨前碑》，全称为《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碑阴刻《史晨后碑》，全称为《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前碑为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刻，17行，每行36字，字稍小。后碑为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刻，14行，每行36字，字稍大而肥厚。后碑为追述，虽为后碑，纪年却在先。《史晨碑》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前后碑虽大小粗细稍有出入，但从风格来看，出自一人手笔。用笔精到，圆润典雅；笔势开张，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端庄严谨。后世评为“八分正宗”。

《乙瑛碑》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莫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隶书18行，每行40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为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规矩而具法度，跌宕顿挫，丰腴浑厚。捺笔沉着有力，骨肉匀称，结体谨严方正，又沉厚朴实，清翁方纲评为“骨肉匀适而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碑四面刊刻，碑阳、碑阴、碑侧都刻有文字。《礼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笔画震动谨肃，波磔肥厚，结体

富于变化，体势典雅，挺拔灵秀。字形长短、大小、宽扁富有变化，生动奇逸。王澐评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礼器碑》历来被认为是汉碑隶书的极则。

《张景碑》全称为《张景造土牛碑》。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立。此碑内容为记汉代张景修建水渠、造土牛等事。今存河南南阳汉馆。此碑虽为残碑，然而仅损四周，存字较多，字迹清晰完整，便于临摹。此碑书法颇具特色，字形宽扁，笔画劲健。

《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光和八年（公元183年）完成，历时8年。刻石46块，两面刻字，共20多万字。石经刻成后初立于洛阳太学。后因历代变乱，几经迁徙，已散失残毁，现今只留有一些残石。现存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残石》，是国内体积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块，上刻《周易》的部分内容。有人认为《熹平石经》为蔡邕所书，但从书法风格来分析，不似整饬一人所为。此刻经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是两汉书法的总结。此刻经一出，汉隶亦彻底走规范标准化，点画平匀，波磔显明，规矩平板，端方严整，石经严整的书风，对魏晋和唐代的隶书有深远的影响。

二、圆润秀美 刚柔并济

汉隶极讲夸饰，左波右展，烂漫多姿，装饰味极浓。这一类汉隶名碑有《曹全碑》、《华山碑》、《孔宙碑》、《韩仁铭》及《武威仪礼简》等。此类碑刻充分表现了汉隶的八分特点，既讲规矩，又具变化，华美飘逸，神韵超然。

《曹全碑》全称为《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由于敞等人镌立。碑原在陕西省郃阳县，今存西安碑林。此碑在汉隶中别为一体，北方刻立有如此秀丽飘逸的隶书，令人赞叹，此碑书韵优美，多为人师。字形平扁匀整，用笔方圆兼备，流利婉畅，美妙多姿。因此碑明代出土，故保存完好，笔道锋棱清晰，较少残损，此碑书法秀逸道丽，笔数翩翩，若国画中的兰叶，修长柔美却又道劲飘逸。以圆笔为主，体势扁平，左舒右展，秀逸中出之以道劲，流畅中含有沉稳，学者不可不知。

《华山碑》全称为《西岳华山庙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创立于陕西华阴县华山庙内。隶书22行，每行38字。碑额有篆书6字。此碑据考证为郭香察所书，是著名的汉碑之一。原碑毁于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的关中大地震，仅有拓本流传。传世拓本有四：即“长垣本”（今存日本）、“四明本”、“华阴本”（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顺德本”（今存香港）。此碑用笔道劲灵秀，板尽变化。结字匀称，端庄秀丽，颇具装饰性，兼有“方整”、“流利”、“奇

古”三者之长，被清人朱彝尊誉为“汉隶第一品”。

《孔宙碑》全称为《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东汉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七月刻立，为孔子19世孙孔宙的墓碑。碑现存山东曲阜孔庙，隶书，15行，每行28字。碑阴3列，每列21行。有碑额。篆书10字。此碑书法端庄挺秀，别有风姿。行笔沉稳中又具飘逸夸饰之变化，点画舒展伸张，风度自然。结体紧凑，疏密和谐，风神逸宕，笔势超远。

《韩仁铭》全称为《汉循吏故闻喜长韩仁铭》。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十一月刻。隶书，8行，每行18、19字不等。有碑额，篆书10字。碑下部残，现存河南省荥阳县。此碑书法遒丽舒展，结字疏朗宽博。左规右矩，法度森严中讲求笔势的变化。清代书法家杨守敬评为：“清劲秀逸，无一笔尘俗气，品格当在《百石卒史》（指《乙瑛碑》）之上。”

《武威仪礼简》以此为代表的居来出土的竹简、木牍和帛书，是古代人亲笔所写，未曾经过雕凿，是秦汉隶书的重要代表。解放以来出土的主要是：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的战国《青川木牍》（现存四川省文管会）；1957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现存湖北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西汉时期的《马王堆帛书》；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的《银雀山汉简》；1981年由甘肃武威县文管会收集，现存武威市博物馆的《武威王杖诏令册》；195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县磨嘴子汉墓的《武威仪礼简》；1976年出土于甘肃居延的《居延汉简》等。其中汉简隶书尤以《武威仪礼简》为代表。此为西汉晚期的隶书木简，共9篇，469枚。这些木简虽不是一人所书，但书风却基本统一，严整规范中具有生动的变化，是成熟的汉隶作品。在结体上巧妙地使字的重心向左偏移，而使右方空灵宽阔，以利子由左向右出锋。左收右放，左顾右盼，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用笔中锋、侧锋交替使用，粗细方圆极具变化，朴拙洒脱，娴熟自如，神韵飘逸。多为后世学隶者所师法。

三、气象沉厚 巧拙相生

斩替方正的汉碑，雄强茂密，别具一格，和圆笔类汉碑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后来北魏方笔楷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类方笔汉碑著名的有《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郃阁额》和《封龙山颂》等。此类汉碑隶书方笔多而明显，精神外耀，丰茂劲挺，斩循爽利，端严厚实。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威长荡阴令张君表頌》，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

186年)立。明初出土。碑原在山东省东平县,现存泰安岱庙。隶书,碑阳15行。每行42字。碑阴三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有篆书12字。此碑书法以方笔为主,立汉碑方笔之典范,为著名汉碑,风格雄强茂密,朴拙厚实。用笔方直多变,横竖面起收皆切以成方。横角森挺,取势平直。或略带歪斜,拙厚中显灵动,朴实中见神情。结字多变,字形呈上宽下窄之势、偏旁大小错落,以奇取胜。章法疏阔,参差得势。康有为评此碑为“隶中之楷”。通篇粗旷朴茂,气势雄伟,格调高古,逸趣横生,兼有“篆意”、“草情”和“楷法”,对后世习隶者影响很大。

《鲜于璜碑》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1973年出土于天津市武清县高村,现存天津市博物馆,是解放以来新出土的保存完整、字数最多的一通汉碑。隶书,碑阳16行。每行35字。碑阴15行,行25字,有界格,界格不很明显。碑额有10字阳文篆书。此碑与《张迁碑》风格相近,是汉隶中典型的方笔精品。字体方正遒劲,笔势浑厚凝重,用笔含蓄沉着,方整质朴。结字严谨茂密,古朴壮美。字形长短不拘,大小由之,不为界格所限,生动自然,沉稳朴茂。字势错落有致,舒展自然。

《衡方碑》全称为《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东汉灵帝章宁元年(公元168年)立。碑原在山东省汶上县郭家楼。现存泰安岱庙。隶书,23行,每行36字。碑额有阳文隶书10字。此碑为汉隶鼎盛时期的作品,以方正朴茂,古拙厚实,沉郁凝重著称。它用笔方圆得势,多含兼意,收而不发,力含字中,自然古拙,尤以丰腴浑厚,朴茂凝整取胜。不像别的汉碑,左右开张,八分取势,只求在字的内部寻找空间对比的数果,其外紧内松,雄浑敦厚,为汉碑中的上品。

《郃阁颂》全称为《汉李翥析里桥郃阁颂》。东汉灵帝建宁五年(公元172年)二月刻。为厚建隶书刻石,与《汉石门额》、《汉西狭颂》,并称为著名的汉代“摩崖三颂”。隶书,20行,每行27字。据南宋洪适《隶释》所记,《郃阁颂》为仇靖所撰,仇靖所书。此刻原在陕西省略阳县西25里的郭家地嘉陵江西沿岸,距水面8米左右。此处古称“析里”、“白崖”。此颂现存略阳县灵崖寺,已剥落严重,模糊不清,残存200余字。此石刻用笔方圆兼施,而以方笔为主,棱角森挺中又见厚拙圆润。笔道于横平坚直中显粗细、起伏变化。字形取正方外满,丰腴浑厚,继承了汉篆体方笔折、庄严朴厚的优良传统。其章法均匀齐整,在凸凹不平的摩崖石面上更显一丝不苟,朴茂雄深,被誉为“隶中之篆”。

《封龙山颂》又称《封龙山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十月立。隶书,15行,每行26字。现存河北省元氏县城内薛文清祠。此碑结体宽厚,气势博

大，用笔犀利劲健，笔画收敛，姿势挑法含而不露，尖锋颇多，垂笔以悬针出之，瘦劲细伟。杨守敬评曰：“汉隶气魄之大无逾此。”

四、圆劲峭拔 奇趣横生

汉碑风格多样，一碑一奇，确无虚言。在大露汉碑中个性张扬，独具风貌，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圆劲峭拔、奇趣横生一类的隶书名作，如《石门颂》、《大开通》、《杨淮表》、《西狭颂》、及《莱子侯刻石》等。这类汉碑除了年代较早的西汉新莽时的《莱子侯刻石》外，其余皆为东汉时期著名的摩崖刻石，而目都集中在陕西南部一带。从书风上来分析，包括《莱子侯刻石》都多用平直细劲的笔法，奇险雄健，烂漫恣肆，为汉隶中最自由纵放的一类刻石，与大集的汉代竹简、木牍、帛书上的民间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石门颂》全称为《故司隶校尉为杨君颂》，又名《杨孟文碑》。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于陕西褒城褒斜道石壁，现存陕西汉中博物馆。此刻为摩崖刻石，隶书122行，满行31字，额题隶书“故司隶校尉为杨君颂”10字。王升撰文。碑文多为四字一句，押韵可以通读。内容记载杨孟文修葺石门道之事。《石门颂》为摩崖刻石，放较少森严肃穆的庙堂气象，而多了些跌宕野逸的山林之趣。用笔沉稳，圆入圆出，遒劲细健，入石三分。笔势圆劲纵放，结体洒落自然，遒古婉蜒。介乎于碑、简之间，用笔圆劲，不事雕琢，天真质朴，如简牍帛书，但因其书于崖壁之上，碑高近丈，气势宏大，绝非简帛所比。写来率意，无拘无束，长短不拘，大小由之，巧夺天工，恣肆奇异，烂漫雄放。被誉为“隶中之率”，自由、奔放、朴拙、雄逸，清新，对后世隶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隶中草书”之称。评者谓此碑：“具雄肆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敏学，力弱者不能学也。”诚非虚妄。

《莱子侯刻石》又名《莱子侯封田刻石》、《天凤刻石》、《莱子侯瞻族刻石戒石》等。西汉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刻。石原在山东邹县卧虎山下，清代乾隆五十七年为王仲磊最早发现。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移于孟庙，现存山东邹县孟府。《莱子侯刻石》不大，字亦不多，但却弥足珍贵，是现存较少的西汉时期的早期隶书刻石。隶书，7行，每行5字，有竖界格。此碑用笔逆入平出，笔道尖细犀利，遒劲稳健。结体宽博，取横势，气息朴厚古拙，无明显的波挑磔尾，属汉代早期古隶的代表作品。用笔结字取天然变化。毫无修饰之最，别有风韵。清人方朔评为：“以最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杨守敬评为：“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最古，亦为最高。”